

第7卷第2期 2014年3月

Vol. 7, No. 2, March, 2014

国际高等教育

国际问题

不断变化的全球外交与教育发展.....	43
腐败如何危及高等教育?	45
作为新殖民主义的在线课程“慕课”: 谁掌握着知识?	48
顶尖的大学还是顶尖的高等教育体系?.....	51
国际教育中的学习效果评估.....	54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大胆的高等教育议程: 会引人注意吗?	56

中国: 英语与人才竞争

中国: 将英语移出高考.....	59
中国“英语热”进入转折点.....	61
中国会在全球人才竞争中胜出吗?	63

国际学生流动

评分系统和国际学生流动.....	65
德国: 学生海外交流	67
加拿大吸引国际生源的移民政策.....	69

非洲: 质量保障与监管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高等教育监管趋势.....	71
加纳: 私立高等教育的质量保障.....	73

聚焦乌克兰

乌克兰的全国统一考试创新.....	75
苏联解体后的乌克兰: 高等教育国际化.....	77

新书推荐	80
------------	----

不断变化的全球外交与教育发展

Patti McGill Peterson

美国教育理事会 (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 国际化和全球参与方面的首席顾问

电子邮箱: PPeterson@acenet.edu

外交是国际关系的艺术, 曾经是政府或其所任命的代表的专属职权。在过去的 100 年中, 其相关影响因素不断扩展, 包含了“公共外交”。“公共外交”这一术语涵盖了所有旨在促进国家间友好关系的人物和活动。

外交实践和统治一样, 各国通过教育扩张了国家利益。在漫长的殖民历史中, 教育帮助宗主国影响殖民地人口。在后殖民时代, 教育仍然在提高国家影响力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

高等教育和软实力

近年来, 教育和学术交流在打造国际关系方面的作用被冠以“软实力”之名。软实力不是依赖于武力, 而是利用思想和文化的优势来影响与其他国家的友好关系和倾向。教育是一个国家打造“软实力”最理想的装备。

由美国政府资助的“富布莱特奖学金项目”(the Fulbright Program) 是公共外交的典范, 通过高等教育得到深化。其主旨是培养民族和国家之间的互相了解, 该项目一直是政府和民众创造的软实力的混合产物。它宣称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曾资助过的、最大规模的学生和学者流动。政府官员常常称这是美国政府最好的外交财富之一。参与了该项目的其它国家的公民和领袖, 由于自己的这段经历, 常常表现出对美国及美国人民的熟悉和喜爱——这为美国在国外赢得善意。

尽管其他国家尚未复制“富布莱特奖学金项目”, 但它们也积极通过教育拓展国家外交。英国文化协会 (the British Council) 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英国文化协会在世界各地都有办公室, 有时作为英国大使馆的附属机构运行, 视自身为英国教育机会和文化关系的国际组织。与“富布莱特奖学金项目”的模式一样, 英国文化协会也为赴英国学习的人提供奖学金, 并资助英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高校教育交流。

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 (the German Academic Exchange Service) 发挥了类似作用, 但不那么显著。非西方国家也以西方国家的方法发展外交。2004 年, 中国产生了自己的教育外交理念, 设计建立了旨在对外推广中文和中国文化的“孔子学院”(Confucius Institutes)。截至 2011 年, 全球 104 个国家和地区共开办了 353 所孔子学院。

是外交还是霸权

由开明利己主义所支持的软实力关系常常标志着不平等。这一问题在东西方合作和南北半球合作中被专门提出。由于发展中国家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不断增加, 他们不愿意阻止那些希望通过奖学金或高校建设资助而提供帮助的国家。这些帮助可以为相关国家发展人口素质, 有利于全球发展。然而, 作为教育外交的接收国, 他们需要理解那些希望建立关系的国家的动机。

我们正在步入全球参与加速的时代，国对的教育外交正在被机构对机构的关系以及更广泛的参与者所取代。对于教育外交的接收方，情况变得更加复杂。这也意味着政府不再是最主要的参与者。尽管政府可能将院校的跨境活动视为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各院校按照自己的战略和动机，正在越来越向国外拓展运营。

向海外进军？

美国教育理事会发布的全球高等教育报告指出，院校既相互竞争，又彼此合作。报告没有讨论高等教育对公共外交的作用，而是更多的强调了院校发展自身全球参与战略的需求。这不仅会导致与美国之外的教育机构、还有与各国政府间直接的关系和相互协商。当美国大学的校长们访问印度、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时候，他们常常会见政府官员，这是与其他国家建立教育关系的努力之一。

当大学校长之间签订学术合作协议的时候，布置和礼节都具有签署国际协议的风格和微妙之处。签字和所有会谈一样，象征了院校代表之间开展的重要基础工作。但是，满怀期待有时也会遭遇深深的失望。其结果对院校和国家关系都有负面影响，尽管后者可能是意料之外。

尽管院校必须遵守国家法律并通晓当地习俗，但签署协议时仍然主要依赖于对自身的考量。因此，他们在海外开展活动时仍然

被视为国家代表。由于这种公共外交的特征，其重要性堪比官方的外交协商。所以在签署协议之前，院校双方会将协议的所有重要细节、承诺和预期成果进行确认。这样当意外引发紧张关系时就有裁定问题的方法，这十分重要。

巩固关系的良好外交

在多数教育外交中，寻求全球参与的动机一定是复杂多样的。寻找自费生是更多跨境活动的主要原因。那些高等教育相对发达的国家政府及其院校正在制定特殊计划以接收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学生；而那些高等教育欠发达地区的大学则寻求与他们认为更富声誉的院校建立关系，从而有更多机会提高全球排名。

许多院校正在发展更广阔的国际ization战略，以寻求能将自己变成国际化院校的合作协议。他们可能希望通过全球参与达成一系列目的——充实学术项目，为学生拓展知识和体验，让学生和教师队伍更加国际化，给教师更多参与国际研究网络的机会，以及最终发展出众多互惠互利的双边活动。正如所有可持续关系一样，双方的个性特征以及他们开展活动的道德框架都非常重要。参与教育外交的国家和院校有义务考虑合作伙伴的利益而不仅仅是自己的利益。这才最符合国际关系和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精神。如果进展顺利，这将成为一股提升整体水平的潮流。

腐败如何危及高等教育？

Stephen P. Heyneman

美国范德堡大学 (Vanderbilt University) 国际教育政策教授

电子邮箱: s.heynean@vanderbilt.edu

资源和名利的竞争为高校带来重重压力。较弱的院校更易腐败。在某些情况下，腐败已经入侵大学系统，并威胁到研究成果和毕业证书的声誉。在发生腐败的地方，高等教育投资所带来的个人和社会经济回报率降低。一些国家因为学术不端声名狼藉，所有毕业生和所有院校都遭到质疑。

在招生和录取的初期就可能存在腐败的问题。学生会觉得自己必须暗中支付更高的费用才能被特定的大学专业录取。一些学生为了确保被录取而进行行贿，因为他们不想自己因为没有行贿而落后于人。

财务作假仍然是一项重要挑战。减少公共财政影响了系统对作假的内部控制。由于每个教师可能已经将成本分摊，所以很难进行财务监控。要监控那些从其他渠道获得拨款（非大学行政拨款）的学生组织也非易事。

直接受全球因特网的影响，所谓的“学位工厂”成为入学灾难——成千上万的学位工厂遍布各地。维基百科甚至有一个页面列出了获得学位的“宠物”名单。人们怎样识别学位工厂呢？这些学位学校常常答允在短期内就能用很低的花费获得学位；它们认可非学术的经历；它们的网站列出的地址常常只供邮寄用。同样的，假的认证中介问题也很大，他们承诺快速评估和永久认证。

跨境教育项目提出了三个方面的问题：学位认可，利用招生中介鼓励国际学生入学，

以及声誉有问题的院校在国外建立项目。尽管跨境教育服务带来了新的腐败风险，但它也可能带来跨境诚信。卓越的跨境高等教育服务可以为当地的学生和院校提供难得的机会去考察一所清廉的院校如何运作。

为了吸引学生，院校可能会夸大毕业生的成功事迹。对于营利性院校以及行业内低质量的项目而言，这可能是一个特有的问题。学术诚信包含诚实、信任、尊重、公平和责任，是学术机构声誉的基础。缺乏诚信的行为包括学术剽窃、欺诈、使用未经授权的作品、购买答案、数据造假、从互联网下载答案、分数造假、论文发表欺诈。此外，还包括用礼物、金钱或性贿赂以获得好成绩。

需要谨慎讨论的议题

明确的范围。当大学运营不善的时候，一些人会认为这是腐败的迹象。然而，低效率、权力集中、决策缓慢、拒绝分享机密信息，这些并不是腐败的标志。当教育机构寻求非传统的收入来源时，一些人会将其与腐败混为一谈——但是前者是合法的，后者不是。

腐败程度的区别。每个国家都有腐败的现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腐败是均匀分布的。有些是全局腐败，影响了整个系统；有些是偶发性腐败。有些是财务腐败；有些则集中在学术腐败上，例如学术成果剽窃。国际学

生的留学目的地与腐败有关。总的来说，学生会离开那些腐败猖獗的地区，更青睐腐败较少的地区。

院校腐败和个人腐败的区别。腐败的原因和解决方法都需要分开来谈。院校腐败，即财务造假、非法采购商品和服务、逃税等，这些是能够通过立法处理的问题。个人腐败，即包括教师行为不端、考试作弊、剽窃、研究结论造假等，这些行为违反了职业道德规范。首先是通过立法对这些行为进行主要控制。第二是大学内部控制。立法不应该试图容忍学生和教师个人的腐败行为。

环境和腐败

尽管收入竞争为教师带来压力，但这些压力不足以作为参与腐败的借口。同样，声称到处都是腐败行为所以自己不得不参与腐败，这样的借口也是站不住脚的。即使是在那些腐败无处不在的环境中，仍然存在腐败的“抗拒者”。

反腐败措施可以国际通用吗？

一些人认为，反腐败的措施应该基于各国的价值观和法律。尽管无数的例子似乎都能佐证这一点，但在有些情况下，反腐败措施已经是通用规范。例如，“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Times Higher Education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涉及了40多个国家的大学，这些大学在其网站上所列出的有关教师、学生、行政人员、诚信委员会的诚信守则中，98%的基本道德原则都是相同的。

未来的工作

国际机构应该发挥重要作用。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the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试图寻找抵抗高等教育腐败的措施，并提供预算外的资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可以帮助各国建立相关举措，包括检查程序、信息公开和透明守则、裁决机制（例如师生行为判定法庭）等。

欧洲理事会（the Council of Europe）和欧盟（the European Union）应该发挥重要作用。为了参与“博洛尼亚进程”（the Bologna process），大学和国家都在寻求认证。认证程序可以包含有关对抗腐败的机制。相关机构也应该发挥重要作用。在项目认证标准之中，审批过程可能是上述腐败行为的基础。此外，各国应负责开展反腐败行动，朝减少腐败、增加透明度、转变公众认知等这些方向努力。

“透明国际”的定期调研通过测定一国被认为的商业和政府的腐败程度帮助人们增进了对于一般腐败的理解。相似的指标可以被用于高等教育。如果发现腐败的参与度和公众的观念都在好转，这是值得骄傲的事。如果政府鼓励这些调研，就是“健康”的信号；如果政府严禁这些调研，就标志着他们尚未理解消极应对腐败的风险。

观念是最重要的。否认错误行为很常见。当事人会问“证据在哪儿？”这是错误的方法。当一个机构被认为腐败的时候，损害已经造成了。认知是有害影响发生时唯一需要的证据；这也是为什么所有世界一流大学都在网站上发布反腐败的策略。这暗示着，任何一所大学，无论其隶属任何文化，如果有成为世界一流的雄心，就必须建立一个类似的道德标准。这可能需要改变许多大学校长和行政人员的观念；也需要大家从自我保护

以及否认的处理模式转为透明的、积极介入的痛苦。如果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将自己置于这
的处理模式，即证据可能令人不安或者极其种道德审查之中，其它大学也会这样做。

作为新殖民主义的在线课程“慕课”：谁掌握着知识？

Philip G. Altbach

Philip G. Altbach: 美国波士顿学院 (Boston College) 国际高等教育中心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终身教授、国际高等教育中心主任

电子邮箱: altbach@bc.edu

“慕课”，即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是使用信息技术实施高等教育的最新做法。该理念利用了技术在互动教学和内容送达上的巨大发展。尽管慕课仍处在初级发展阶段，但其主办者和众多评论人士、政策制定者都满腔热情，视之为向大量受众送达内容的低廉而又创新的方式，而其他人士则看出其中蕴藏着商机。

但慕课运动还有一个方面尚未被充分分析——谁掌握着知识。考虑到支持慕课的内容和技术的发源地，答案显而易见。慕课主要由美国引导，可以获取的大部分课程都来自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的大学。主要的教育提供者也位于技术发达国家。使用的技术发展自美国的硅谷、马萨诸塞州剑桥的肯德尔广场和其它信息技术创新中心。在这个竞技场上，早期的使用者占有重大优势。全球化扩大了经济强国作为学术中心的影响力。与此同时，慕课将技术运用于已有的知识网络，有望扩张这种高等教育霸权。

世界上欠发达地区的其他人正在加入慕课的行列，他们很可能学会使用别处发展起来的技术、教学理念和教学内容。这样一来，在线课程就预示着西方学术界的全球影响力会继续扩大，其高等教育霸权因此而增强。

慕课最初的两个主办者 Coursera 和 EdX 都起源于美国，前者由斯坦福大学 (Stanford University) 的教授在加州硅谷建立，后者由

哈佛大学 (Harvard University) 和麻省理工学院 (Massachusetts Institution of Technology) 建立。许多其它顶尖大学 (主要位于美国) 已经参与进来。Coursera 在众多领域提供 535 门课程，其中 24% 来自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澳大利亚之外的其他国家。EdX 提供 91 门课程，其中 19 门来自北美和英国之外。一些课程的注册学生多达 30 万，注册学生数平均约 2 万。大部分学生来自美国以外。课程毕业率似乎很低，不足 13%。参与慕课运动的许多人力图从慕课谋利，不过目前这个目标还没有达成。

谁掌握着知识以及为什么这个问题重要？

绝大部分慕课课程都由美国教授创建并实施教学。有经费发展优秀慕课课程的公司和大学 (发展成本高昂) 都是美国的。根据 Udacity (一个美国慕课提供者) 的估计，创建一门课程要花费 20 万美元，而且这个价格可能会涨到 40 万美元。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估计，发展成本介于 5~10 万美元之间，还要求具有精良的技术。

慕课课程的多半内容基于美国的学术体验和教学理念。总的来说，多数慕课的阅读材料都来自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许多课程是用英语授课，即使演讲和材料都被翻译成

其他语言，内容大部分还是反映了原始课程。绝大部分授课人都是美国的教师。虽然可能会发展出更大的多样性，但基本内容依然如故。

由于国家传统和实践的不同，课程、教学法和整个教育哲学的方式会不同，也不能代表多数慕课授课老师和提供慕课课程的公司和大学的授课方式。毫无疑问，那些发展慕课的人会宣称，他们的方法是最佳的，反映了最先进的教学思想。但是，应该还存在其他广泛的学习方法和许多传统。

为什么这很重要呢？无论是知识还是教学方法，都不是中立的。而是反映了学术传统、方法论导向以及特定学术体制的教学哲学。学术的这种民族性在许多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尤其明显，连科学也不能置身事外。尽管那些发展慕课的人无疑都渴望做得尽可能的好、服务众多受众，但是他们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制于其学术导向。

由于所使用的绝大部分材料都来自西方学术体制，科学课程中使用的例子很可能来自美国或欧洲（因为这些国家主导了高影响期刊上的文章），并由来自优秀大学的知名教授来讲授。探究学习的模式反映了西方主流。尽管这一知识基础和教学法导向无疑反映了当下优秀实践的理念，但它可能并非是优秀科学探究或科研内容的唯一道路。

这些问题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表现得更加尖锐。在文学、哲学等领域，多数课程反映了西方传统和知识，西方的文学标准，以及西方的哲学假设。社会科学反映了科学探究核心相关的西方方法论和基本假设。从人类学到社会学，主流理念和方法反映出西方趋势，特别是美国学术界的。主要的学术期刊、编辑、编辑委员会、大学学术出版商都位于全球知识中心，比如波士顿、纽约、伦敦。

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中心的主要理念将很自然地主导学术话语，并反映在多数筹备和教授慕课的学者的思想和立场中。Coursera、Udacity等慕课的门户将力图维护其所诠释的标准，这将无疑加强西方方法论和知识导向的霸权。

英语不仅主导了21世纪的学术知识，也主导着慕课。英语是国际学术期刊的语言；位于非英语环境的研究人员越来越多地用英语进行学术写作和交流。主要的学术网站也都倾向于使用英语。因为英语是学术交流的语言，英语学术文化的方法和知识导向在全球处于支配地位。

对于发展中国家，这其中暗藏危机。当下，各个研究中心所提供的慕课对用户而言容易获取且价格低廉，但可能抑制本土学术文化、本土学术内容和课程的出现和发展。慕课有潜力为非精英受众提供教育机会，因此也会扩大主要学术中心的影响力。

新殖民主义

那些负责创建、设计和传授各领域慕课课程的人基本上来自英语国家主要大学的学术文化。他们并不想将自己的价值观和方法论强加给其他人，但他们的影响力还是无预谋地、有组织地散布开来。学术文化的强强联合，慕课创建者和传播者的地理位置，以及多数慕课的创建者和授课者的立场，都保障了那些主要以英语为母语的学术体制的支配地位。世界各地选择参与慕课的几百万学生似乎并不关心他们学习的知识的特征或教学的哲学。中等收入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大学似乎也不关心慕课提供的知识源头或导向以及慕课教学法背后的教育哲学。

我并不试图暗示慕课共同体有什么不良动机。我也并不是在阐述当下多数慕课的内

容或方法论因为来自占支配地位的西方学术界就是错误的。但是我认为，有必要指出慕课这一正在崛起的声势浩大的教育运动强化

了当下占支配地位的学术文化，可能会让不同的声音更难被人听到。

顶尖的大学还是顶尖的高等教育体系?

Benoît Millot

独立咨询顾问、前世界银行教育经济学家

电子邮箱: benoitmillot2013@gmail.com

国际大学排名已经成为有关高等教育界的常用指征。随着排名影响力的不断增长,各种对排名的反应也随之而来,积极跟从、消极抗拒不一而足,也有彻头彻尾的批评。多亏那些批评,排名的方法论一直得以改进——指导原则(例如“柏林原则”[Berlin Principles])和保障措施(例如“国际排名专家组”[International Ranking Expert Group])层出不穷。然而,严厉的批评都涉及一个事实:这些排名显然都只注重少数国家的个别院校,即世界一流大学。因此,大学排名忽略了世界各地绝大多数的大学,后者不能和世界一流大学一样在同一个运动场上竞争。也因此,政策制定者倾向于优先发展少数院校,从而提升国家在排名中的位置,其代价往往是牺牲国家高等教育体系中其余的学校。为了对抗这些不希望看到的不良影响,有人试图测量、排名和比较不同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而不是单个的院校。为了搞清楚这些尝试是否成功,本文将这些结果与从大学排名得到的结果进行比较。

两种排名

作为比较的第一步,需要选择大学排名和高等教育体系。“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又称上海排名)、“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Times Higher Education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和QS排名拥有最受欢迎、最有名气的排名榜单。在这三大排名的基础上,“网络计量学排名”(Webometrics)因为其创新的一面也被选入。高等教育体系排名的选择范围有限,尽管早前在评估整个体制上已经探索出多个方法,但“U21排名”(Universitas 21,由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领衔推出)是个中翘楚,目前还没有其他竞争者。“U21排名”使用了四大类/模块(资源、环境、网络、加权产出,权重分别为25%、20%、15%和40%),共22个指标。所属指标来自于传统的、可检验的来源(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大学信息系统、SCImago数据库等),对高等教育体系最重要的那些方面提供了全方位的视角。尤其有趣的是,指标包含了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以反映外部效率(尽管该指标需要一些微调)。另一个受欢迎的点在于,指标努力反映高等教育体系的监管环境。然而,这一维度的指标形态难以捉摸,依赖于数据来源的整合——对U21院校进行调研,利用来自著名院校以及来自互联网网站的数据。最后,基于四个模块指标使用的“总体”指标高度依赖于各部分的权重,所以仍然存在争议,因为这种权重具有任意性——这也是所有大学排名的陷阱。

所选择的四个大学排名的结果需要在国家层面上标准化,这样一来,体量的影响被

中和。更具体地说，每个国家顶尖大学的数量除以国家高等教育适龄人口。这个指标可以被视为每个国家世界一流大学的“密度”。首先，一个国家顶尖大学的数量和“密度”之间没有显著相关性。第二，四个大学排名被标准化之后的结果非常相似；他们的方法论在一些方面具有本质的区别，但是也具有共同的特征。第三，能够在四个排名中的至少一个排名上拥有列入世界前400名院校的国家不到40个，这是一个相当同质的俱乐部，大部分是高收入经济体。在四个排名中，顶尖大学的密度在小而富的地区最高：丹麦、瑞士、瑞典、芬兰，之后是爱尔兰、荷兰和中国香港地区。

结果的相似性

“U21 排名”（2012 版）以及四个标准化之后的大学排名的结果相比较，显示出一个清晰的结论：两组结果之间存在强正相关。为了审核这一发现，将“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和“U21 排名”的2013年的结果进行了相关性检验，结果显示出更强的关联。将“U21 排名”的四模块结果和主要大学排名的关联性进行进一步测试，相关性显著，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相关，无论哪个排名（第一是上海排名）还是哪个模块（相关性最强的是资源和产出）都是如此。两种排名的趋同中，唯一值得注意的例外是美国，它在“U21 排名”中排第一，但是美国的顶尖大学密度却并不显眼。

结果的趋同

这些对比可能让人想到：世界一流大学的高密度保证了这个国家成为世界一流的高等教育体系。也可能给人们造成一个印象：

“U21 排名”和大学排名结果的相似性意味着，前者排名未必比后者含有更多的信息。但是三种观察表明，这种结论并不一定正确。第一，“U21 排名”从G20成员国和自然科学基金表现最好的研究机构国际排名中选择了50个国家：因此，尽管“U21 排名”的国家范围要比三大排名稍微大一点，对这些国家的选择模式对富国和对研究进行大量投入的国家构成了双重偏好。第二，“U21 排名”将大学排名（“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和“网络计量学排名”）的一些指标合并在一起，组成自己的指标，甚至用产出指标计算世界一流大学的数量，这当然解释了美国例外的原因。最后，对22个指标的重新分类强化了对研究的巨大偏好。因此，两种排名的趋同几乎是必然的，同时这也是“U21 排名”所用方法论的逻辑结论。最后，需要铭记一个重要因素，世界一流的高等教育体系是一个难以捉摸的概念，包含许多维度，例如教育机会平等、内部效率、教与学、与国家社会经济的关系、还有外部效率等等。这些维度的确很难捕捉，无论“U21 排名”多么努力要反映其中的几个方面，他们都无法完全解释国家高等教育体系的所有复杂性。

改进空间

比较各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仍然是一个需要优先解决的问题。“U21 排名”已经向那个方向迈出了坚实的脚步，但还需要走得更远，才能展现自己的用处。面前有两条关键道路：一是深挖体制的结构，从而让排名能更好地联系环境和背景；第二，扩大排名国家的数量和多样性——获得更多数据，包含更多国家。走这两条道路势必会得出与那些大学排名有更显著区别的结果，并可能更好的达成

“U21 排名”的目标。“U21 排名”说明针对高等教育体系的排名具有巨大的潜力，是大学排名的重要补充，并有助于高等教育政策制定者获得更多信息，做更好的决策。

国际教育中的学习效果评估

Darla K. Deardorff

国际教育管理者协会 (the Association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dministrators) 主任、美国杜克大学 (Duke University) 研究学者

电子邮箱: d.deardorff@duke.edu

鉴于高等教育信息公开不断扩大的趋势,许多高等院校正在评估学生全球化或跨文化学习相关的学习效果。然而,对那些评估需要谨慎对待,因为虽然评估越来越流行,但评估并不总是经过良好设计、得到有效实施或取得最佳效果的。

很多时候,参与到国际教育学习效果评估中的院校会这样做:让一个人或一个办公室来“负责评估”;只用一种评估工具;而使用那个工具的原因不过是另一所大学或某个特定类别的大学正在使用该评估工具。有时,一个院校会设计自己的评估工具,但常常并不检查该工具的信度或效度。

更多的时候,评估只是事后想法或临时功夫,在计划评估阶段并没有开展足够的工作,没有清晰的目标和学习效果声明,也没有准备好评估计划。此外,一些院校或项目可能只是一边将收集的数据搁置,一边却宣称已经做完了评估,评估过程就到此为止了,甚至在接下来的数年里只要有经费或人手就重复这一过程。评估数据极少提供给学生来帮助他们继续学习和发展——然而,将评估结果反馈学生这一点却对跨文化学习至关重要。我们列出了国际教育中保障学生学习效果评估质量的若干原则。

路线图

着手开展评估的高等院校一开始常常

问:“我们应该使用哪个工具?”尽管这个问题看起来像一个合理的起点,但是首要问题应该是:“我们希望测量的是什么?”这个问题将导向对办学使命和目标更细致的测量,而使命和目标则决定着用什么评估工具最为恰当。在考虑国际教育项目的评估日程时,后退一步并反思以下三个问题会有助于描绘出评估路线图:第一,我们要达到什么目标(使命/目标)?第二,我们怎么能达到目标(目的/学习效果)?第三,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到达目标(证据)?学生学业成功的证据可能不只是算算数字(也就是产出),还有学生对学习的认知(包括间接证据,例如通过调研或技能清单)以及真实的学习过程(学生学习的直接证据,例如家庭作业的电子档案)。使命、目标和学习效果的一致十分关键,将自然地指出需要什么工具或方法来证明这些成果已经达成。

没有完美的工具

评估工具必须和所阐述的目标一致,选择评估工具的依据是“针对目的的适宜性”,而不是因为方便或熟悉。院校或项目经常想要一个“完美的工具”,而这显然是不存在的,特别是对跨文化学习而言。事实上,当评估一些类似全球学习或跨文化能力发展这样复杂的事物时,严格的评估牵涉到多种方法、多种视角的使用,而不是限于一种工具的使

用。此外，关键在于，院校应该准确依据那些工具测量什么（而不是工具宣称测量什么）、工具的信度和效度、工具针对特定院校/项目背景的效度、工具的理论基础，以及工具与要评估的特定学习效果之间的匹配性，来彻底探索现有的工具。每个院校都有自己要优先考虑的学习效果，因此，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评估工具。

关于项目或课程的预备阶段（准备期）和结论阶段（后期）的评估决策，好的评估意味着评估工作能按照评估不断开展的实际情况不断调整，避免仅仅依赖于学习体验之初或之尾的印象快照。此外，最有意义和最有用的跨文化学习评估可能包含一个纵向维度，并向学生提供反馈。

先计划再开展工作

高质量评估的另一个关键原则在于，在整个评估计划中需要竭尽全力并作好工作记录。一个评估计划不仅要列出测量什么、怎样收集数据，还要有关于所有参与人员（需要至少一个人或办公室）的细节、时间表、实践细节以及怎样使用和传递数据。最后一点很重要：必须用到数据（例如：为了学生反馈、项目改进和推行），否则就没有必要收集数据。尤其，评估办公室不应该先收集数据再试着决定“怎么处理数据”。一开始花10%的时间来发展一个评估计划并想透这些问题，这对之后90%花在评估过程上的精力是非常必要的投入。

团队协作

评估常常看起来来势凶猛、令人望而却

步，特别是只有一个人或一个办公室负责做这事的时候。有效的评估实际上是一个跨机构团队，团队中有各方利益相关者，不仅包含国际教育专家，还包括评估专家、学生、教师以及其他国际教育学习效果利害攸关的人士。有效领导和支持对评估的成功起着重要作用。一旦这个跨机构团队组建完成，团队就要将需要评估的学习效果置于优先位置，检查已经进行的评估工作；并在寻求额外评估工具及方法之前，将当下的评估工作与评估目标和效果匹配起来（也就是说，不需要重新改造评估工作，或增加可能并不必要的、昂贵的评估投入）。

结论

有效评估的其它原则还包括启用一个控制小组、选取最佳样本、开展纵向研究等等。本文已经列出了若干原则，希望针对真正有助于国际教育学习效果开展严格评估能有更进一步的反思和讨论。尽管院校参与学习效果评估值得赞许，但仔细考察所开展的评估工作的质量也很重要。指引性的问题可能包括：评估工具/方法与使命和目标匹配得如何？（那些工具究竟评估什么，以及为什么要用它们？）使用了多个工具吗？评估计划准备好了吗？在整个课程/项目中，除了准备期和后期，评估是如何融为一体的？数据是怎样被使用的？有多人或多个办公室参与到评估中吗？评估计划本身定期审查改进吗？

如果高等院校慎重对待国际化、评估和学生学习，这种努力就是有效的，其结果会对所有的相关人士都有意义，包括我们的学生。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大胆的高等教育议程：会引人注意吗？

Christopher Ziguras

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 (RMIT University) 全球、都市和社会研究学院副院长

电子邮箱: chris.ziguras@rmit.edu.au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the 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致力于发展地区经济合作, 自其 1989 年建立以来, 该组织一直都没有对高等教育特别感兴趣, 但这情况可能正在变化。2012 年, 俄罗斯担任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主席国, 该组织的领导人承诺促进跨境合作和联络。但是该组织对地区参与的新渴望是否能够被转变成实际措施影响到院校、学生和教育者们, 还有待观察。

贸易自由化遭遇中国规则

至少从 1990 年代中期开始,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就对扩大国外对教育和培训的投资表有兴趣。澳大利亚是该地区跨境高等教育的主要提供者, 也是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早期国际教育项目背后的驱动力, 该国在世界贸易组织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中也扮演着类似的角色。为了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拉入关贸服务协定千禧年回合的谈判桌, 澳大利亚于 2002 年组织了“教育服务贸易主题对话” (Thematic Dialogue on Trade in Education Services), 并赞助了一系列研究项目: “影响亚太地区教育服务贸易和投资的措施” (Measures Affecting Trade and Investment in Education Service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2001 年与新西兰合作),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与国际教育” (APEC an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2008 年) 以及“影响亚太地区高等教育跨境交流和投资的措施” (Measures Affecting Cross-Border Exchange and Investment in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APEC Region, 2009 年)。

相较而言, 中国对于聚焦跨境教育有效国家法规的项目更感兴趣。在 2003 年引入针对国际教育提供者的新方针之后, 中国赞助了一个令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热切想参与其中的研究项目, 其最终报告名为《在全球化背景下改进高等教育的制度能力: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成员之间的联合学院》 (*Improving the Institute Capacity of Higher Education under Globalization: Joint Schools among APEC*, 2004 年)。最近, 中国在上海召开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研讨会, 会后发表的报告名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地区的政策能力建设和跨境教育监控》 (*Capacity Building for Policies and Monitoring of Cross-Border Education in the APEC Region*, 2011 年)。

尽管澳大利亚和中国领导的项目是为了应对跨境高等教育治理的挑战从两个相反的方向相向而行, 却都强调了国家法规和质量保障的重要性。为了发展这种跨地区的能力, 2006 年和 2011 年, 澳大利亚和美国分别领导了关于发展国家质量保障管理体系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项目。

这些各种各样的论坛和报告为该地区中层官员之间开展信息共享提供了机会, 特别

是让新兴经济体的官员们接触了解更发达体制的实践，也许这已经为政策趋同做出了些许贡献。然而，这些关注点并没有大量反映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教育部长们的日程上。2012年之前，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教育部长会议声明中极少提及高等教育。

海参崴正在发生什么？

2012年，教育部长们同意提升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在教育合作中的作用，这被称为“庆州行动”（Gyeongju Initiative）。俄罗斯联邦旋即自告奋勇要在俄罗斯担任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轮值主席的那一年领导一场高等教育运动。之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贸易部长们倡议要拓展“跨境教育服务贸易”并深化亚太地区的教育合作（作者的重点）。他们要官员们检验那些能“更好地促进该地区学生、研究人员和教育提供者流动”的方法。一个月之后，俄罗斯赞助的高等教育论坛“塑造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教育”（Shaping Education within APEC）在海参崴召开，论坛邀请了贸易部长们参加，并增加了两个要点：“加大高等院校之间的互动，以及增加有关教育服务贸易的数据收集”。

在承诺“教育合作和促进教育服务的跨境交流”的同时，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明智地打造着愿景，使其在教育与贸易两个部门都富有意义。这些愿景在2012年末得到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海参崴经济领导人会议（APEC Economic Leaders' Meeting）的充分支持。之后，俄罗斯赞助了2013年初的“亚太地区第二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高等教育合作会议”（the second APEC Conference on Cooper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Pacific Region），会议地点依然是海参崴。

所以，俄罗斯似乎已经成功地将跨境高等教育置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议程之首。俄罗斯的确拥有大量国际学位学生，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字，2010年有129 690名国际学生，但是其中只有小部分来自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成员经济体，绝大部分都来自前苏联国家。同样，俄罗斯之前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高等教育方面并不如此积极。

会议地点可能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领导人峰会在远东联邦大学（the Far Eastern Federal University）新建的（海参崴）海岛分校举办，学校及时完工以举办峰会，而会议的举办也为大学留下设备设施。该大学的网站宣称，“远东联邦大学2010~2019年战略规划的主要目标受到联邦拨款的支持，旨在让远东联邦大学成为一所世界一流大学，与亚太地区的教育、研究和创新环境融合在一起”。所以，海参崴市和这所国际大学似乎是俄罗斯扩大对该地区教育参与的重要努力。

当下的矛盾

去年八月，我促成了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召开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论坛，该论坛由澳大利亚外交和贸易部赞助，吸引了来自14个国家的贸易和教育官员、学者和教育机构的代表。很多讨论都围绕如何提升制度能力、如何支持更多国际参与这一普遍热望（招收国际学位学生、构建交换关系、与外国机构开展教育项目合作、研究的国际化，以及教育）。然而，为了进一步开放教育体制以允许学生、学者和教育提供者能更多地流动，各国之间和各国内部仍然有十分巨大的观念分歧。一些参会者认为，由于各国体制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所以并不存在一个公平竞争环境；为国内的教育提供者引入更大的国际竞争会破坏他们的国家发展战略。

在任何一个受到保护的行业，都不鲜见既得利益者反对竞争者涌入他们的市场。大学在某种程度上和其它服务提供者的举动并无二致，例如银行或航空。但是教育行业扮演着独特的角色，对于哺育社会和经济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因此，各国政府要提防引入那些让重点院校觉得自身地位被削弱的改

革，尤其是当那些院校由教育部运营时。

我们可能与另一个“博洛尼亚宣言”（Bologna Declaration）离得还远，但是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兴趣点代表一个新迹象，那就是加快该地区高等教育体制融合是一个不断升温的政治意愿。

中国：将英语移出高考

杨锐

香港大学比较教育研究中心教授、主任

电子邮箱: yangrui@hku.hk

对英语的接纳是显示中国积极参与外部世界尤其是西方社会的例子之一。这种态度不仅在中国现代史上是空前的，也和现在其它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互动不同。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英语教育在中国的国家和个人两个层面的职业发展上都是极具重要性的方面。精通英语被广泛视为国家和个人的优势。英语教育一直被中国人（包括领导者和民众）认为对国家现代化和发展有着重要作用。

中国将英语的主导地位视为历史事实，已经采取了各种政策来适应它而不是拒绝它，努力促进国际化。学习英语不再仅仅在中国国内很重要。对任何认真学习的学生，它都是最低要求。在中国，说英语的人比其它任何国家都多。中国各级各类学校里的考试都包含英语水平测试。英语在学者们的职业晋升中是普遍要求，包括那些并不常用英语的学者。随着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即高考）提出改革，中国选择学习英语的非凡现象很有可能逐渐褪去。

改革计划

作为中国改革这一“一考定终身”体制改革计划的一部分，教育部在2013年底提出，英语考试将在2020年之前退出高考。取而代之的是，考试将会一年多次举行，学生可以选择英语考试的时间和频率，以减轻学习负担。而且只计算学生获得的最高分。这一政策将从2017年起在若干省份和城市试点。新的考试和录取体系预计将在2020年前

建立起来。

其实在教育部发出信号之前，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就宣布，北京市的高考各科目分数将从2016年起改革。英语总分将从150分降到100分，语文总分将从150分升到180分。数学总分维持150分不变。文理总分从300分变成320分。英语考试可以一年参加两次。例如，如果学生在高一就得到100分，他/她就能在高二、高三免修英语课程。

其它地区，例如江苏、山东、上海，都在准备自己的高考改革。山东已经提出取消高考英语中的听力部分。江苏已经在讨论未来取消英语。尽管细节还未最后确定，总方向却很清晰：高考中要弱化英语，强化语文。

争议

改革行动受到大众的普遍支持。在去年12月9日凤凰网更新的一个超过22万参与者的调查中，在被问到对北京高考改革的观点时，82.82%的人支持，13.55%反对。类似的，当被问到他们是否会支持降低英语分数提高语文分数时，82.79%支持，13.01%反对。

相反，改革计划在教育专家那里存在分歧，他们不认为减少对英语能力的重视是一个好主意。有些人质疑改革将会降低英语学习负担，以及替代性的考试是否能反应学生英语水平、帮助学生更好学习英语。在这些中间，决定引发了激烈讨论。上海纽约大学校长俞立中表示，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考什么和怎么考。教育部将英语撤出高考视为中国的文化自信，这为辩论增加了复杂性。

多数辩论集中在改革是否会减轻高考负担以及怎样分配时间学习中文和英文。胡瑞文来自上海市人才研究会，是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的一员，他说这一改革将向学生释放一个讯号：他们应该更多的关注母语而不是一门外语。对他来说，学生们现在花太多时间学习英语。他们需要好好学习自己的母语。他相信改革将会帮助学生更好的学习中文。

蔡基刚是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的一位教授，也是上海高校大学英语教学指导委员会的主席。他反对降低英语在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中地位的任何计划，因为这样的计划没有考虑中国对外语能力的需求——外语是迎接全球化和高等教育国际化挑战的手段。他担心中国学生可能不会再努力学习英语了，这从长期来看会有不利影响。

没讲到点上？

强调英语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战略角色，在国家教育发展议程上对英语给予高度优先

地位，都被证明是有益的。中国的努力已经在得到回报。英语作为一门全球语言，它作为交流工具的功能已经加速了中国的对外贸易，并在过去几十年中帮助中国发展经济。英语还促进了中国的对外交流。中国重点大学的学者和学生在与国际学者交流时几乎没有障碍。他们流利的英语已经为中国当下快速、成功的参与国际社会做出了贡献。中国研究人员撰写并发表在国际期刊上的经过同行评议的论文在过去年三十中提高了64倍。

中国的现代化开始于外语学习。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对外语的态度已经成为中国国际化的指征。与显示信心相反，决策显示出一定程度的文化沉溺。高考很可能仍然是大学录取的最重要的指标：在对雇员的英语语言能力需求不断增加的时代，忽略英语的重要性，而不是利用机会让英语不那么依赖于考试、更重视实际运用的流利程度，这将会减少学校和学生学习英语的努力。如果这就是结果，中国近年来的成功还会继续吗？

中国“英语热”进入转折点

王晓阳、李杨阳

王晓阳：清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主任

电子邮箱：wangxy@tsinghua.edu.cn

李杨阳：清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生。

近来，中国的一些省份已经提出要改革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即高考）——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降低英语在高考中的重要性。这已经引发公众的讨论热潮，有的支持，有的反对。一些支持者认为，中小学英语教与学花去了学生太多时间，这减少了花在中文上的时间，因此同意降低高考对英语的重视。其他人认为，英语对学生阅读西方科学书刊、参与国际经济活动和交流仍然很重要，因此反对降低高考英语分数。江苏省是第一个宣布高考取消英语考试的省份。英语考试将会一年举行两次，给分形式将是字母等级。北京现在也在就改革计划征询公众意见，该计划提出英语考试满分将从150分降低到100分，而语文考试的满分将从150分提高到180分。为什么英语的分数降低而语文的分数升高呢？中国的“英语热”已经到达转折点了吗？

为什么高考改革从英语开始？

考虑到中国的英语教育耗时低效的事实，改革英语考试很容易得到公众和教育界人士的理解和支持。中国的英语教育现在正在变得更加以考试为导向，这为改革提出了紧迫的要求。中国学生已经在学习英语上投入了非常多的时间和精力；然而，这并没有带来积极的结果。许多学生已经学习英语多年，不断记忆单词、做习题，但到目前为止仅仅能够学习到所谓的“磕巴英语”。

现在，只有极少的学生能进行流利、简洁的跨文化交流。北京高考改革的目的之一就是稀释英语考试的选拔功能，并恢复英语作为交流工具的功能。因此，就像改革方案所显示的那样，北京决定提高高考英语听力理解的比例；考试内容也将会被限制在基础知识和能力的范围内。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议题是政府对待将考试组织权力分给第三方社会机构的态度。如果改革计划在全国推行，高考英语将会得到社会机构的支持（就像美国的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 [the 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 一样），2016年一年举办两次。然后，学生在高中三年将能有高达6次的考试机会，这将大大减轻考试压力，有望引导学生为了交流使用而学习英语，而不是仅仅单纯地为了在考试中拿一个更高的分数。

英语的重要性将会降低而语文的重要性将会提高？

过去很多年，中国教育界人士已经注意到英语在教育中的重要性过于大了，以至于人们有时会忽略学习中文的重要性。在这种担忧下，随着英语考试分数的降低，北京的高考改革设计将语文分数提高30分，从而强调中文作为母语和基础核心科目的重要角色。改革也明显反映出政策制定者对中文和中国文化的巨大关注。与英语相比，教师更有必要引导学生欣赏中国文化的魅力，因为

学生和家长对英语的投入大于中文。由于高考是中小学教育的指挥棒，政策制定者明智地使用高考来引导教与学。我们认为，通过调整英语和语文的比重，学生和教师可以被引导去更多地关注中文学习。

中国“英语热”进入转折点

围绕高考英语的改革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英语热”已经在中国进入转折点。自从1970年代末恢复高考以来，英语在高考分数中的重要性就从30、100不断提高到150分，和数学、语文一起成为三大核心科目。相应的，一波“英语热”席卷全国，英语培训成为一项巨大产业。现在在中国，说英语的人口规模世界最大。

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进一步增强，中国一直在加快与世界各地的贸易活动。随着国家的发展，世界各地有更多学生选择学习中文，包括奥巴马（President Obama）的女儿们和副总统拜登（Biden）的孙女。英国首相大卫·卡梅伦（David Cameron）最近在访问中国后指出，英国的学校不应该教小孩子太多法语和德语，而应该聚焦中文。为了满足这一需求，与外国加强文化交流并尝试传播中文已经成为越来越紧迫的问题。外国的“中文热”也推动教育领导人们反思和调整语言文化的教育政策，从而提升中国的语言文化教育，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过度的“英语热”降温。

中国会在全球人才竞争中胜出吗？

查强

加拿大约克大学 (York University) 教育学院副教授

电子邮箱: qzha@edu.yorku.ca

过去十年中，中国似乎一直在全球人才竞争中引人注目。著名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简称“千人计划”），其中包括“青年千人计划”和“外专千人计划”，旨在将海外和国际人才吸引回国。在这个计划实施之后，中国政府近来又启动了“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简称“万人计划”）。与前者不同，后者专注于国内人才，保证在未来十年选拔和支持一万名科学、工程和社会科学领域的顶尖学者——这些人中的前100名将必须以赢得诺贝尔奖为目标。所以，中国现在明确提出了跃升为创新领袖的雄心，将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国内人才。事实上，“千人计划”并没有真正达到预期目标。到目前为止，海外高层次人才并没有大规模回到中国。在回国者中，拥有博士、硕士和学士学位的人的比例是1:8:1。也就是说，大部分归国者都是那些在海外待了很短时间拿个硕士学位的人。统计显示，超过150万中国学者和学生留在国外。是什么让中国的全球人才战略（以可观薪水、慷慨的启动经费和其它财政刺激闻名）没能产生预期的结果的呢？

观点

运用人力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观点可能会为这一令人困惑的问题提供有力的解释。例如，激励中国学者和学生回国的动力可能是与人力资本逻辑有关的限制，该

逻辑强调从各类教育培训中获得的有形知识。海外华人可能觉得，他们在现在的国家主要被当做人力资本对待，在那一特定环境中，几乎没有机会满足自己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需求。那么，像“千人计划”这类人才计划，是否能够提供相等的拉力因素？答案则是并不一定，因为这种计划也主要基于人力资本逻辑。许多海外华人可能看到回中国享受文化资本所带来的更好机会，文化资本与人力资本不同，强调获得来自文化传统和环境的隐性知识，文化资本常常表明了社会的更高形态。然而，当面临满足社会资本的问题时，他们将会发现自己在中国也有“天花板”般的瓶颈难以逾越。

现代社会资本的概念化可能赋予个人自由选择更大的重要性，从而创造出一个更加有凝聚力的社会。然而，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中，社会资本已经与“关系”（人脉）的概念紧密结合，尤其是与权贵官僚的关系。在这方面，由于多数归国者与中国在空间上脱离已久（对一些人来说有几十年之久），因此并没有享受到优势，反而遭受劣势。近年来中国的发展模式表现出一些成功方面（中国迅速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获得了信心（2020年左右中国有望超过美国成为最富有的国家）之后，愈发是这样。在这一背景下，那些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和实践几乎很难为外部理念和人而改变。

饶毅和施一公的例子反映出的矛盾

饶毅和施一公是两位著名的海归科学家。饶毅曾担任美国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神经学教授。他2007年回到北京大学,担任生命科学学院的院长。施一公曾是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终身讲席教授,2008年辞去普林斯顿职位,开始在清华大学追求职业发展,担任生命科学学院院长。他们两人都被视为由“千人计划”吸引回国的顶尖人才。

显然,饶毅和施一公都没有准备好回中国做一个纯粹的学者。相反,他们希望凭借他们的社会资本施加影响,改善中国的研究文化和大学教育。无论是在他们回应一些例如为何选择回国的问题时,还是在他们自己的写作中,这一点都表现得十分明显。2010年《科学》(*Science*)杂志发表了两人联名撰写的文章,文中公开宣称中国当前的学术文化“浪费资源、腐蚀精神、阻挠创新”。尤其,他们以研究经费决策的官僚方式说明“扼杀创新,让每个人都明白,与官僚和几个权势科学家的关系是最重要的”。他们还指出“为了在中国获得大笔经费,做好研究并没有与权贵官僚和他们中意的专家打好关系来得重要,这是公开的秘密”。看到这个有问题的研究文化“甚至浸染了那些新海归的思想,且海归们迅速适应了本土环境并维护起不健康的文化”时,他们感到无比沮丧,并呼吁应进行有意义的改革以构建健康的研究文化。

施一公和饶毅看见许多同事面临这种

“不健康文化”时因为害怕“抗争失败”而选择保持沉默。尽管他们感到焦急,但他们似乎已经成为自己对所看见的不健康学术文化宣战的受害者。在两次失败的尝试之后,饶毅宣布自己抵制参与中国科学院院士的竞争,而施一公则仍然在等待自己第二次尝试的结果。如果像饶毅和施一公这样的著名海归人才在面对腐败的研究文化时都要受社会资本弱点之苦,那么“万人计划”选拔的国内人才如何能打破它呢?

在饶毅和施一公的例子中,他们所获得的文化资本似乎与政府所宣传的相距甚远。虽然他们反对官僚主义,但是现在他们却时常被引用作为“千人计划”的成功案例。在许多其他人的例子中,他们的社会资本大多被中国当下的研究文化所同化,这反过来促使他们变成所谓的“优雅的利己主义者”。简而言之,如果不对中国当下的研究体制和文化进行彻底检修,“千人计划”或“万人计划”就很难达到其原定的目标。另外,西方体制一直在大量吸引全球人才,他们可以获得一个启示:如果对全球人才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给予的关注不足,危机将会逼近,动摇他们的体制对全球人才的吸引力。

注:2013年12月19日,施一公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在此之前,同年4月他已经被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the US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外籍院士和美国文理科学院(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外籍荣誉院士。

评分系统和国际学生流动

李静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Columbia University) 教育学院博士生

电子邮箱: jing.li@tc.columbia.edu

国际学生的流动目前是世界的重要政策议题。其中部分原因在于,国际学生尤其是那些科学和工学领域的学生为科学技术提供了稳定的人力资源来源。从1960年代起,加拿大和其它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就开始使用一种评价学术成就的评分系统选择高技术移民。这些评分系统用“分数”评估申请人的素质,青睐那些在本国接受高等教育的国际学生,并帮助他们在毕业后成为本国公民。因此,评分系统被认为对国外生源具有吸引力。

评分系统是什么?

作为选择移民的方法,评分系统萌芽于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基本上,这个系统旨在用评分的方式评估移民申请人的素质。评分系统设计中三个关键因素:标准、权重和门槛。各国的标准都不同,但普遍使用五个主要来源:教育、职业、工作经验、语言以及年龄。权重一般是指各个标准的比例。如果标准的最高分数是100,可能会平均分配权重。最终,基于过去的经验和/或对潜在申请人的数量估计,可以将一定的比例划为合格线(75%或以上)。分数超过合格线的申请人会被筛选出来。

移民接收国施加影响的证据

英国过去推行非常严格的移民政策,目

前在一些方面仍然沿用。2008年以前,到英国工作、培训或学习有80种不同的方式。这80种入境计划主要分三类:工作许可签证,免就业许可证的签证,以及“技术移民”。在实施技术移民之前,有462 609名非公民学生和341 791名非居民学生赴英国的高等院校学习。实施一年后,两种学生的入学数量各增加了8%。

在加拿大,评分系统始于1967年,从属于《1952年移民法案》(*the Immigration Act of 1952*),用于选择移民。该系统最初的目的是应对技术劳工的短缺。2002年6月11日以前,特殊行业工作准备类别被赋予更高的权重。这意味着,如果一个申请人的工作其它加拿大人都做不了、不愿做、不能做好,那他/她超过及格线(70分)的可能性就更高。2002年6月,加拿大改革了评分系统。此后,语言、工作经验和整合能力被赋予更多的分数。这一改革可以被解读为应对劳动力市场高技术人才需求而做的调整。目前的评分系统有六个选择移民的因素:教育、语言、经验、年龄、职业以及适应能力。一个人可以得到最高分是100,目前的及格分数线是67。2002年,加拿大国际学生的数量不到4万。2002年实施偏向高技术人才的政策改革后,国际学生数量变成原来的3倍,达到12.5万。1998~2002年,高等教育的外国学生年平均入学人数为36 340人,2002年以后也翻了两倍。事实上,2002年后加拿大的评分系统的

确吸引了更多国际学生前来接受高等教育。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评分系统相似。本文使用澳大利亚的系统来说明大洋洲评分系统的设计。1982年,在加拿大框架的基础上,澳大利亚引入“澳大利亚普通技术移民”政策(the Australian General Skilled Migration program)。该项目的主要特点是依据“技术职业列表”来给分,列表上列出了澳大利亚需要补充劳动力的短缺行业。申请人必须在近期拥有相关技术工作经验;否则相对较难符合技术移民的资格。1998年以来,国际学生选择澳大利亚求学的流动没有出现任何中断变化,因为澳大利亚的评分系统从1980年代以来一直相对稳定。国际流动表明,1990年左右有一个明显跌幅。原因是1989年的《移民修正案》(the Migration Amendment Act)设置了人才库,一方面降低了及格分数,另一方面却增加了等待时间。所以,修正案的确吓到了潜在的技术移民。

移民输出国施加影响的证据

由于评分系统位于接收国,输出国的影响常常模糊不清,并且很难与其它因素区分开来。本节以从输出国到英国和加拿大的人员流动作为指标,加以分析。

中国是最大的国际学生输出国。利用中国教育部的数据,作者计算了政策实施前后数年的年平均流出人员数,观察政策是否起作用。结果显示,加拿大改革评分系统之后,

从中国到加拿大的年平均流出人员数翻倍了,从5189人增加到11509人。“高技术移民项目”启动后,从中国流出到英国的人员数也增加了18%。

印度是第二大人口国。学生流动的首要数据来源是其劳工部(the Ministry of Labor)。接收国实施评分系统后,印度输出到英国和加拿大的人数增加了。到英国的多了一倍,到加拿大的多了两倍。

俄罗斯并不是传统的输出国,但从1990年代开始送出很多学生到国外留学。同样,前后对比表明,同期从俄罗斯流向英国和加拿大的平均人数增加了,到英国的增加了25%,到加拿大的增加了57%。

结论

随着政策的实施,政策制定者在考虑国际学生或高技术工人的移民时,经常提到“人才流失”或“人才引进”。最近,一些研究人员创造了“人才竞争”一词。

将评分系统放到更大的背景中讨论,这些系统事实上是人才分类和选择的一种方法。在国家层面,为了应对全球人才竞争一个国家需要“国家人才系统”来发展其核心竞争力。只要大学、各行业和政府同心协力招聘世界各地的人才,竞争才可以变成“人才分享”。同时,政府需要同时关注外国出生和本国出生这两类人才的发展,从而增强其国家竞争力。

德国：学生海外交流

Jan Kercher、Nicole Rohde

Jan Kercher: 德国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 (the German Academic Exchange Service)

电子邮箱: E-mail: kercher@daad.de

Nicole Rohde: 德国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

电子邮箱: E-mail: rohde@daad.de

2013年4月, 德意志联邦政府和州政府通过了一项致力于实现和推进德国高校国际化的常规性战略。这一战略的核心内涵是为每一位研究生增加出国学习的相关机会, 确保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学生在学期间出国交流不少于三个月或取得至少15个欧洲学分互认体系 (European Credit Transfer System) 的学分。

有了这一国家层面的目标, 德国大大超过了生源流动目标的欧洲标准: 按照博洛尼亚进程 (Bologna process) 设定的标准, 欧盟及其成员国需要在2020年前完成各自目标; 至少20%的欧洲高等教育区 (the European Higher Education Area) 毕业生须完成一项海外学习或相关训练。

海外学习是必需的吗?

海外学习被认为在推动学生自我发展和增强跨文化能力方面颇具益处。学生身处国际劳动力市场工作的同时还能通过了解治疗疾病、寻找能源解决方案、抵抗饥饿等跨越国界的共同话题做好自身准备。正如国际教育协会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的阿兰·E·古德曼 (Allan E. Goodman) 所言: “这里所指的全球化, 即学生想要在我们这一纷繁复杂的世界里获得工作, 就必须到海外去学习。”

海外学习意味着学生们要离开自己熟悉并能赋予他们有效权利的区域。赋予权利意味着学生们学习怎样对自己的生活以及自己所处的社会负责。对他们而言, 明确自己的社会角色以及怎样参与社会活动并塑造自我十分重要。因此, 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 (German Academic Exchange Service) 提出, 国际经验应成为高等教育学习的必要组成部分。国际流动不仅是个人学业生涯的一种财富, 而且还是塑造个性的独特经验和规范模型。

国际生源流动

当前有两种国际生源流动模式: 短期交流 (常指学分互换) 和以获取海外学位为目的的长期交流 (常指学位流动)。有关人才流动的研究显示这些模式间的区别不仅仅是名称上的不同: 可获取的德国学生数据显示出两类学习模式在一些关键环节具有显著的不同。例如, 奥地利、荷兰、瑞士, 与英国一样, 是主要的学位流动目的国, 然而这三个国家并未扮演短期海外交流的主要角色。英国同美国、法国和西班牙在学生学分互换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同时, 学习语言和文化相关课程的学生是短期海外交换学生的主体, 但是在学位流动的项目中并非为典型代表。

德国的国际学生流动

自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德国学生在学位交换生中的绝对与相对数量和比例均有所增加。具体而言,被海外院校录取的德国学生从1991年的34 000人左右升至2011年的134 000人左右。有趣的是,来自德国的学位交换生近年来迅猛增加。在2005~2011年间,德国籍国际学生人数每年平均涨幅为10.6%,而1991~2004年间,这一增长率仅为2005~2011年间增长率的一半(5.3%)。然而,与2010年的10.2%相比,2011年时这一增长率仅为4.6%。接下来的几年里,我们应该能够看到增长率的下滑是暂时性的还是一个长期低增长周期的伊始。

德国国内研究生的调查数据显示了学分互换的德国学生情况。2010年,有30%来自德国高等院校的研究生具有最少三个月的海外相关学习经历。与学位流动项目人数的持续增长相比,学分互换学生所占比例在过去十年中保持稳定。这意味着德国已经达到了广义上的欧洲标准(2020年欧洲高等教育区具有20%的学分互换研究生),同时联合科学会(Joint Science Conference)和德意志学术交流协会所制定的国家目标也将会实现。

最后,一些重要的结构性发展也与博洛尼亚进程联系在一起。当前,一些学生很早就到国外去了,他们可能在那边呆上不长的一段时间,利用这一所谓的“交流平台”达

到目标。这些交流活动出现在学生攻读学士和硕士学位之间或硕士和博士学位之间。学校可以搭建这种交流平台,比如与兄弟院校为期一年的交换生项目,即由一方院校派出一名或多名高素质学生到另一所学校进行交流学习。

德国未来的潜在推动力

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通过发展各式各样的项目以不断减少国际生源流动的障碍。其中主要的障碍是由于缺少经费而导致学生失去学习机会,以及由于本国和海外项目学习要求的不同而导致调和上的困难。有两种特别有效的方法可以解决这两个问题:增加联合培养项目的数量和整合所谓的“交流窗口”(即交流学习所需要的时间)整合至学士和硕士项目中去。加上足够数量的奖学金,这些方法也许能够帮助德国在学生海外交流活动方面取得诸如20世纪90年代时期所观察到的长足发展。

注:德意志学术交流协会与德国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中心(the German Centre for Research on Higher Education and Science Studies)一道,编辑和发布了学生出入境和国际生源流动的数据。参见网站:
wissenschaft-weltoffen.de

加拿大吸引国际生源的移民政策

Anita Gopal

加拿大女王大学 (Queen's University) 研究人员

电子邮箱: anita.gopal@gmail.com

全球化的影响下,世界各地的大学通过参与激烈竞争进行知识经济的大比拼。这一情形促使加拿大制定移民战略和计划以吸引和录取国际生源。在婴儿潮的一代人退休时,加拿大将面临严重的劳动力短缺,而这会对该国经济增长和国力发展造成负面影响。因此,加拿大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已迫在眉睫。营造良好的国际氛围、吸引并留住国际生源是推动加拿大经济发展的一种途径。加拿大移民部 (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Canada) 的数据显示,政府将优先引进那些希望在加拿大取得成功同时又能够促进国家经济增长、实现长期繁荣并提升全球竞争力的高技能人才 (例如印度和中国的一些人才)。那些在加拿大就读的国际生源即是理想的目标人选,因为他们大概已能融入加拿大社会。

在认可国际生源对加拿大经济增长重要性的基础上,加拿大移民部对其移民体系进行了改革,使其运转更加快捷、灵活并适应学生的需求——这是其区别于其他国家的主要特征。这样一来,新的移民政策和项目就能更加具体地针对国际学生的学习、工作,并让这些人 (特别是毕业生) 更容易成为该国的永久居民。举例来说,国际学生被准许在校内外每周工作不多于 20 个小时;他们还可以申请工作签证 (Post-Graduation Work Permit), 即一种为期三年的公开工作申请,使学生可以为加拿大所有产业的企业雇主效力。国际生源毕业生可以申请“省提名移民

计划” (Provincial Nomination Program), 从而成为加拿大的永久居民。这一申请可以在硕士或博士在读期间提出,或者在取得学位之后提出。

加拿大高校同样希望能与美、英等主要的留学目的国在最优秀的国际理工科生源竞争中取得比较优势,从而增加其“市场份额”。进一步讲,国际留学生可以为加拿大创造实实在在的收益。从加拿大外事与国际贸易部 (the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的报告来看,2010年,加拿大国际学生在学费、住宿及个人事务上的支出就超过了 77 亿加元 (2008 年为 65 亿加元)。而 69 亿加元的收益是由在加拿大长期学习的 218 200 名国际学生创造的。这一报告还显示该国从国际学生获得的收益已经远远超过未锻轧铝 (60 亿加元) 直升机、客机和宇宙飞船 (69 亿加元) 的出口商品价值。

美国的移民政策

在“911”袭击事件之后,美国一贯的国际学生门户开放政策有所收缩。政府收紧边境和更加严格的签证要求使移民政策更加紧缩。正如《2013 国际学生的流动趋势》(2013 *International Student Mobility Trends*) 报告概要中指出的那样:美国已然放缓步伐,重新审视其移民和签证政策。然而,美国依然是国际学生出国学习的第一选择,主要因为美国著名院校学位项目具有吸引力。

与加拿大的多种方式取得工作并成为永久居民的政策不同,持有 F-1 签证的美国学术项目国际学生仅可以申请短期实习 (Optional Practical Training) 而获得工作经验。这是一种与学生学业相关的临时性雇佣项目,学生可以在完成整个学年的学习后申请并获得总计 12 个月的实践训练,也可以在学年结束之前或之后申请。科学、技术、工程以及数学领域的学生可以得到 17 个月的签证延长期。如果学生有资格更改其身份 (F-1 签证身份),他们就必须去申请一种 H-1B 签证(一种非移民的临时性工作签证)。这类签证允许持有者在美工作六年,但是学生必须首先取得工作协议,而且雇主也要向移民局提出申请。

英国的机会

近来,英国政府颁布并实施了更为严格的国际学生签证限制政策,涉及入境要求、学生在学期间可享受的服务以及完成学业后可获得的工作机会。《高校财政环境》(The Funding Environment for Universities) 报告指出,针对学生移民英国和签证申请的改革将于 2013~2014 学年生效。这一改革包括更加严格的英语语言技能要求和有关学生移民史、教育背景和资金状况的一系列诚信调查,政府同时不再实施“留英工作签证计划”(the Post Study Work scheme)。这些变化让来自非欧洲国家的国际学生在获得毕业后留英工作许可方面面临更大的挑战。这些政策也不鼓励永久居留、研究生学习或劳动力滞留,而且主要影响了印度、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的海外学生录取。

未来的方向

在加拿大通过灵活的移民政策和方法专注于同美国和英国争夺国际学生时,高等院校也制定了吸引高技能人才移民的战略。加拿大高校受到联邦政策的激励,成倍招收国际学生,到 2022 年前,这一数字可能从 2011 年的 24 万人达到 45 万人。如果加拿大想要争夺国际学生的市场份额,那么就必须要形成管理机制以应对变化后的录取工作。同时,加拿大高等院校必须发展有竞争力的学位及项目以迎合目标生源群体的需要,并为他们提供获取相关学校资源(例如教师、研究经费、学生服务、图书馆资源等)的机会。换言之,如果加拿大高校没有合适的资源来支持国际学生培养,移民政策又怎么会产生应有的效果呢?另外,政府目前尚未出台正式的国家战略为这些改变做好准备并进行妥善管理。

显然,加拿大主要重视其在吸引国际学生以补足高技能劳动力短缺方面的自身利益。但是,就结果而言,加拿大未能对人才流失问题和从发展中国家吸引高质量生源所产生的主要影响予以过多关注。例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就指出,人才流失已造成每年近 100 000 名最优秀的印度专业人员移居北美,而这估计会让印度损失 20 亿美元。由于持续地从发展中地区吸纳智力资本,加拿大忽视了自己对这些国家的道德责任,或者说它就没考虑自己的人才政策会为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带来何种损害。同时,我们也很难知晓发展中国家如何能从人力资本的流失中得到恢复。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高等教育监管趋势

A. B. K. Kasozi

乌干达高等教育国家委员会前执行主任

电子邮箱: abkkasozi@yahoo.com

自1980年开始, 诸多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陆续建立了通过政府资助的、半自治性质的高等教育监管机构。这些机构协助政府建设、管理以及监管高等院校。监管机构确保本国公民接受高质量的高等教育, 并推动那些提供高层次学习的院校完善高等教育, 优化创新体系, 促进经济发展。经验显示, 监管机构通过在国家和各种提供高层次学习的院校之间扮演中介组织的角色, 实现了政府直接插手微观事务管理的最小化。

质量管理

许多使用英语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赋予监管机构职责以保证高等教育质量。在大多数非洲国家中, 目前的质量保障机制主要涉及两个组织: 一个是由政府资助的自治型外部监管机构, 另一个是每所大学里的内部组织。虽然这两个组织会共同发挥作用, 但监管机构更有资质。这个外部组织(监管机构)颁布并使所有院校执行统一的质量标准。内部组织, 通常是一所大学里面的质量保障办公室, 它主要确保质量标准得到执行。具体来说, 这一组织还负责制定院校的质量标准。

外部和内部组织

国家以外层面的监管框架由监管组织在以下领域实施: 院校认证、独立的项目认证、高校招生绩效、学分累计与转换、教师质量、

考试监管、学术奖励标准化、研究和发表、院校基础设施、教学设备以及对跨国高等教育的监管。

监管机构认为, 质量保障最好由院校自己来进行。因此, 院校被要求设立一个行政单位以监督一所高校所有部门的质量。东非和南部非洲的大学被要求实施一个约3~5年期的常规性院校审核程序。这些审核包括以下领域: 总体审核、院校治理、教学和学习质量、师资质量、教学设备充足性、研究和发表、产出质量、资金管理、与附近社区的关系以及其他相关领域。

在院校完成内部审核后, 监管机构与院校一道实行外部院校审核。外部审核的目的在于填补从内部审核中找出的质量差距。不幸的是, 许多监管机构未能恪守其实施外部审核的责任。

院校认证和项目认证

监管机构通过院校认证协助政府建设大学。院校认证, 即批准院校设立和从事高等教育活动, 它是质量保障的一种工具, 因此与高等教育基础支持工作相关。院校认证是一项既严格又必备的工作。这一工作覆盖了院校各个方面的工作, 包括土地、师资、教学设备、治理、基础设施以及资金状况。

大多数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大学的办学项目都由监管机构来认证。在大多数国家中,

监管机构在认证之前检查办学项目中的基础设施和设备；同时保障项目得以充分准备。监管机构确保这些项目满足最低要求，其设置方式可被接受，并且让学生获得物超所值的教育。

机构自治和学术自由

大多数大学认为其应该自由进行院校治理而不应受到外部力量的干涉——包括自行聘用和解雇教师、制定和开展教学项目、录取学生和以正当理由劝退学生、独立制定和管理预算、利用各种渠道获取资金、制定治理大学中的规章制度以及以规定或章程的形式在法律框架内得到保护。

学术自由的另一面是大学教职员工的个人自由：不受内外部权威干涉、威胁、恐吓的教学自由、科研自由、言论和发表自由。许多监管机构负责人接受上述理念，但仍将自己视作新兴院校发展成熟过程中的守门人。而且，

他们也意识到许多滥竽充数的学校不应该被允许推出低劣的高等教育。

监管机构的干涉或许将被减少

随着非洲大学提供高质量教育的能力不断提升，人们希望监管机构对大学的部分干涉可以逐渐减少。但直到许多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大学可以提供高质量的高等教育时，监管机构仍将通过各种方式继续指导那些学校。由于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不断扩增的私立院校缺乏提升高等教育质量的能力，因而这一工作是至关重要的。许多私立院校缺少学术传统、师资、基础设施、研究能力以及广泛的影响力。这些学校中许多是教学型院校，它们的基础设施贫乏、资金底子薄弱。它们仍需要创建者来和代表国家的监管机构进行指导培育。当它们成为世界一流院校时，监管机构的工作则需要依照各国政府的政治状况来决定其监管范围。

加纳：私立高等教育的质量保障

Linda Tsevi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Albany) 教育行政管理和政策研究系博士生

电子邮箱: E-mail: ltsevi@albany.edu

加纳高等院校的质量保障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由于提供高等教育的私立高校数量增加, 其办学表现受到关注, 因而质量保障得以出现。在非洲其他地区, 政府也认为有必要实施质量保障。

同时, 由于非洲大多数失学现象是由人口骤增而引起的对高等教育需求的增加, 政府对此无力应对, 因此政府对私立高等教育的崛起现象表示认可。然而即便如此, 政府还是要面临高等教育需求增加这一问题。世界银行 (the World Bank) 对公立学校教育支出政策的转变使规模扩大后的高等教育系统承担了比个体利益相关者更为沉重的财政负担, 再加上上世纪 80 年代出现的经济滑坡, 这两大压力削弱了高等教育系统的承载能力。20 世纪 90 年代, 加纳政府对高等教育投资减少, 每名全日制学生的生均经费开支由 1990 年的 2 500 美元减至 1997 年的 900 美元。

私立高等教育的蒸蒸日上并非表明政府从一开始就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公共计划。与此相反, 政府的基本姿态是准许私人利益相关者开辟出一条路来。这或许是一条能够满足公众对快速扩大入学规模利益诉求的道路。目前受到认证的院校包括 3 所特批大学, 53 所大学院, 5 所远程教育机构, 12 所授课学院以及 11 所职业培训学院。在 2008/2009 学年度, 这些院校录取了将近 25 000 名学生,

占全部报考的 177 000 名学生中的 14%。

聚焦质量

私立院校的扩增让政府、学生和公众将目光迅速聚焦办学质量。通过质量保障, 政府和其他各方往往希望能按照学术和基础设施相关标准对办学项目和院校表现进行全方位评价。在公立高等教育领域, 无论是对其总体状况进行关注还是对其质量下滑进行关注, 大多数观点认为公立院校自身已具有内部质量保障机制和规范。同时, 政策机制有时让政府难以插手学校内部活动和利益问题。

质量保障从两个维度开展: 内部和外部。内部保障确保项目和院校具有能够引领标准和实现目标的政策。另一方面, 外部保障由外部组织实施。外部质量保障机制包括认证、质量审查和质量评估。无论政府出于何种动机, 私立院校常常将质量保障进程视作承认其合法地位的良机。

国家认证委员会 (The National Accreditation Board)

1993 年, 加纳政府在政策指导下制定了《临时国家国防委员会 317 法案》(Provisional National Defence Council Law 317), 以此建立了作为全国高校质量保障主体的国家认证委员会 (the National

Accreditation Board)。这一法案在2007年和2010年被其他政府法规所取代。这些规定包含私立高等教育“延期条款”中的一部分。一般来说，国家认证委员会的质量保障既包括院校认证又包括项目认证。高等院校必须满足最低的办学要求——备好独立办学文件并接受委员会的例行检查。

在加纳，一个特别的情况是私立大学开始都是多年接受公立大学指导的附属学院。质量保障的理论基础即是对那些层次不齐、缺乏能力的私立院校给予指导。质量保障提出可供参考的院校名称，分析可获得的学术资源，并制定未来三年如何实现院校目标的时间表。新建私立院校首先要得到审查和资质证明，接着要取得一份临时的官方认定。一所私立院校若想获得办学认证仅需满足学历、学位和层级的最低招生要求、最低入学人数要求和最低的教师资格要求。院校审批是由国家总统颁发的。如果一所私立院校在其附属大学受到不少于10年的指导并达到全部必备办学条件，那么它就可以获得办学审批。

如果一所私立院校的办学项目达到最低的招生要求、最基本的课程要求并提供学生守则，那么其项目就可以获得认证。另外，教育项目与本国质量认证政策也要保持一致。

与国家认证委员会有关的质量保障机制是在财力支持基础上发挥功效的。在加纳，私立院校为个人或合作方所有，具有税收豁免资格。然而，也有人提议要收回这种豁免特权：只有那些从事学术活动而非追求商业目标的院校才有税收豁免资格。这些削弱豁

免权的提议引起了私立院校的愤怒。这些学校提供的课程只需要低成本的基础设施和低廉的设备投资，而一些具体课程量体裁衣，面向的是劳动力市场。例如，他们认为其所依赖的教师大多与市场有着密切联系，而批评人士认为依赖兼职人员会使学术质量得不到保证。

国家认证委员会的问题在于其无法监督那些认证院校提供的未经授权的项目。同时，它也不得不定期监督那些得到认证的私立院校，以确保他们没有录取那些达不到最低质量要求的学生——这种情况在私立院校中很常见。对于私立院校和那些未经认证却开始打着公立院校旗号（貌似已经得到认证）的分校，委员会同样在指导工作上面面临挑战。

结论

加纳的私立高等教育系统受到政策及其他根深蒂固现实因素的影响。加纳的质量保障在院校认证和项目认证方面对公立和私立院校都具有强制性。质量保障实际已带给认证院校一个真实的评判。国家认证委员会已经对私立院校指导工作予以重视。然而，人们还需要继续保持清醒以保护那些对私立高等教育并不持怀疑态度的消费者们。

注：《国际高等教育》每期登出一篇来自“跨境高等教育研究团队”（C-BERT）的文章。该团队总部位于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有关C-BERT的更多信息请访问www.globalhighered.org。我们的推特账号@CrossBorderHE。

乌克兰的全国统一考试创新

Eduard Klein

德国不莱梅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Bremen) 东欧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电子邮箱: E-mail: eklein@uni-bremen.de

和其他独联体国家一样,乌克兰近年来引入了一种新型招生考试制度。2008年开始,所有想上大学的高中毕业生必须参加一种全国统一考试 (the External Independent Testing)。前苏联遗留的腐败的大学入学考试被这种客观的测试所取代,是一种根本性的变革。全国统一考试的主要目标在于抑制腐败发生、推动机会平等、促进高等教育入学平等并建立一个监管教育质量的国家评估系统。

全国统一考试简介

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的过渡阶段,公立高等教育预算大为削减,教师薪酬降到了仅能维持基本生活的水准,而拖欠工资已然成为普遍现象。在许多大学,非常规性的开支和税收补偿了常规性投资,并成为一种制度化的产物。在一些著名院校,招生贿赂达到了10 000美元,而每年招生腐败的总金额接近2亿美元。在新生选拔越来越看重金钱而非成绩的情况下,甚至连那些中等收入家庭都无法负担其子女就读高水平大学。

每所大学都有各自的招生办法。大部分学校采用的是不透明的口试,而这也容易导致腐败。以维克托·尤先科 (Viktor Yushchenko) 为首的亲西方改革派政府启用了一种独立运作的评估和招生制度,而它与美国学术能力测试 (the American Scholastic Aptitude Test) 有一些相似之处。乌克兰教育

质量评估中心 (the Ukrainian Center for Educational Quality Assessment) 的建立旨在发展并监管这一新型考试。这种考试是一种让学生在同样条件下进行笔头作答、可以减少腐败机会的标准化考试。与其他前共产主义国家的改革失败不同,全国统一考试得以成功实施。譬如,仅有16%的俄罗斯民众认为联邦统一考试 (Unified State Exam) 减少了招生腐败的发生。专家和社会各方认为,乌克兰的这一招生改革是其独立以来最有效的一次改革。自橙色革命 (the Orange Revolution) 以来,政治环境不稳定且停滞不前;但这次考试改革实施得有条不紊,且得到了总统尤先科、教育部、国际捐赠组织以及国内民众的共同支持。

反腐效果与民众意见

全国统一考试大大减少了招生中腐败的发生。全国统一考试实施之前,有三分之一的学生受到招生腐败的影响。如今,仅有1%的乌克兰学生报告招生考试中存在腐败。全国统一考试促进了学生的社会流动和区域流动。由于招生是根据成绩而非金钱或非正式的关系而进行的,因而大学开始大量录取低收入阶层和来自偏远地区的学生。以基辅当地的一些顶尖大学为例:改革以前,基辅本地人通过腐败和签订非正式的协议的方式占用了75%的录取名额;如今,基辅大学录取本地生源的比例降至25~30%,而来自全国各

地的、具体不同社会背景的学生都有机会被首都的重点大学录取。

改革取得的进步受到了社会上大部分民众的认可。2013年10月的最新调查数据显示：尽管引进全国统一考试的2008年，只有42%的民众支持此项改革（34%的民众不支持改革），然而到2013年，有53%的民众支持这一考试（不支持的民众比例降至25%）。改革目标群体（学生及其家长）的认可率甚至更高：65%的支持者对24%的反对者。在对参与新考试人群进行问询后发现，目标群体中有68%的人对考试实施效果感到满意。另外，58%的民众认为新考试减少了腐败的发生。目前已经通过改革考试进入大学学习的学生认为，全国统一考试招生考试制度是十分正规的。

然而，新制度并非只产生了反腐的积极影响。腐败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发生了形式上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学生抱怨虽然不需要花钱进大学，但却被学校勒索：若不想被退学就需要付钱。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目前仍旧不得而知。

全国统一考试的未来

2010年总统大选后，国家政治力量发生了变化。时任总统维克托·亚努科维奇（Viktor Yanukovich）是全国统一考试的反对者，曾

在竞选活动中承诺废除这一考试。当时新任的教育部长米特罗·塔巴奇尼克（Dmytro Tabachnyk）也强烈反对全国统一考试。因此，新政府削弱了全国统一考试的地位就不足为奇了。新的招生腐败和违规漏洞则不知不觉地出现了。学生担心腐败行径重现出现，开展了一项“无贿赂招生”的请愿行动。

然而，为了增强控制能力，教育部试图进一步削减全国统一考试的作用。目前在一项新的高等教育立法纷争中，教育部和政府支持最为保守的三项草案。他们计划将全国统一考试置于收费的大学项目中并允许“国家级大学”（目前有116所）重新进行独立招生。这项草案无疑将引发对腐败行为的抗议。另两项进步的提案尚处于讨论中：其中一项提案是由反对方提出的，另一项是由一群学者专家和社会成员代表提出的。与政府提案相对，这些草案旨在加强全国统一考试的作用。目前为止，反对方已经同意支持专家们的提案，并由此期待政府也能让步，同意中立专家的提案。

到目前为止，新法案的纷争已有五年之久，但达成一致依然遥遥无期。政治进程受到诸如抵制与欧盟合作的新政治事件以及大规模抗议活动的影响。由此看来，全国统一考试的未来仍然充满变数。

苏联解体后的乌克兰：高等教育国际化

Valentyna Kushnarenko、Sonja Knutson

Valentyna Kushnarenko: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渥太华教育研究院研究助理

电子邮箱: E-mail: val.kushnarenko@utoronto.ca

Sonja Knutson: 加拿大纽芬兰纪念大学 (Memorial University of Newfoundland) 国际中心主任

电子邮箱: E-mail: sknutson@mun.ca

乌克兰教育科学青年与体育部 (the Ukrainian Ministry of Education, Science, Youth, and Sports) 一贯鼓励实施国际计划, 支持该国在全球特别是欧洲高等教育领域受到认可。与此同时, 由于近期乌克兰决定不与欧盟签署贸易协议, 该国正面临着选择未来合作伙伴的巨大压力, 而这也将对其实国际化战略的发展方向产生影响。在 2013 年 11 月 24 日, 乌克兰学生发起一项行动。他们从各自大学到乌克兰主要城市的中心广场游行, 抗议本国在 2013 维尔纽斯峰会 (the Vilnius Summit 2013) 上不签署《欧盟合作协定》(the EU Association Agreement) 的决定。这些压力敦促苏联解体后的乌克兰高校着眼于实施国际化这一首要战略并加强对国际化目标、愿景和实施步骤的具体表述。

背景介绍

乌克兰地处欧盟国家和俄罗斯之间。虽然乌克兰并不在国际教育中扮演主要角色, 然而该国享有高水平教学和学习的声誉。高等教育在乌克兰民众眼中具有经济独立和发展自由的专业特征。2013 年大学招生活动第一周, 乌克兰公立大学录取了超过六万名申请者。由乌克兰教育科学青年与体育部举办的国际教育展示会于 2014 年 4 月在基

辅举办。在为期 3 天的这一活动中, 海外高校获准录取超过八千名有潜质的学生 (edu-abroad.com.ua)。在传统意义上, 尽管法律、工商管理、经济学、市场营销被视为热门就读专业, 但乌克兰学生如今更青睐到海外学习财政学、信息技术、酒店管理、旅游管理、时尚与室内设计以及其他乌克兰国内高校中开设的新兴专业。与苏联时期学生上大学 (特别是到基辅上大学) 是为了拿学历文凭, 现在的乌克兰高中毕业生一般选择到有竞争力的特定领域以及提供海外交流项目的专门院校学习。而那些提供赴海外学习并获得学历机会的大学也鼓励乌克兰大一新生到那些有密切海外合作关系的院系就读。

对于学生们持续增加的海外学习的热情, 乌克兰的大学受到激励, 重新分配和平衡现有资源以获取属于自己的国际机会。乌克兰人朝着欧盟和俄罗斯方向搜寻国际化市场。虽然因为长期合作伙伴关系的减少而受到批评, 但大学却稳步采取措施, 以达到国际标准并确保办学质量, 并且为建成“世界一流”大学首先实现国内而非海外的院校组织战略。

乌克兰人提及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往往意味着“欧洲化”。院系把国际化战略放在欧洲框架内并强调培养学生具有“统一欧洲:

知识经济和泛欧洲文化遗产”精神的未来办学目标。在2005年5月，乌克兰接受了欧盟官方邀请，加入一项博洛尼亚宣言（Bologna declaration），通过在区域高等教育系统中互通有无和携手共进参与“欧洲高等教育一体化”。在线课程以及合作院校所开设的课程与日俱增，这可以对本国高校开设的课程作以补充，例如欧盟坦帕斯—塔希斯项目（the European Union Tempus-Tacis' s projects and programs）、伊拉斯莫斯教育、科研与职业培训计划（the Erasmus-Mundus Programme）、管风琴成人教育项目（the Grundtvig Programme on adult education）以及夸美纽斯（the Comenius Sub-Programme）子项目。

当前环境

《高等教育法》（*the Law on Higher Education*）的新版本（2012年12月颁布）和国家教育发展计划《乌克兰21世纪》（*Ukraine-XXI Century*，2002年4月）致力于在乌克兰建立更多创新和有效的国际学术合作。合作作为共同研究创造机遇，而学者流动则能使大学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新的竞争。这种竞争在毕业生就业和吸引合作伙伴及资金方面尤为突出。虽然乌克兰的师生们对政府干预或围绕国际化进行的宣传持有怀疑态度，但仍有相当一大批学生希望到海外求学并期待增加就业机会。目前，超过25000名乌克兰学生在海外学习。他们还将马耳他、意大利、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加拿大作为未来的求学目标国。

乌克兰聚焦三个方面的制度建设：（1）行政导向的高级国际化战略；（2）本土课程的国际化发展；（3）组织重构。在办学项目方面，乌克兰人优先发展联合课程计划，同时还参加师生互访交流、海外夏令营学校、

合作课程计划（大会报告、校园活动以及海外访学等）、海外语言学习和国际研究等活动。乌克兰大学国际联盟（the 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f Ukrainian Universities）成立，首先与波兰进行的“知识三角：教育—科研—创新”项目（The Knowledge Triangle: Education - Research - Innovation）是推动知识和技术转移的主要跨境合作。新合作将面向英国、瑞士、法国、德国、西班牙、瑞典、奥地利等国正在发展中的科技领域的联合/双学位项目。与加拿大的合作涉及不断增加的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以及与之相伴的环境问题研究。目前，联合/双学位计划的发展反映出乌克兰大学为同西方国家实现学位授予一体化的远大抱负。

在推动全球学术联系的同时还要规避人才流失。大多数乌克兰高校在很大程度上需要结构和组织上的变革。一些问题阻碍了合作、国际化战略实施以及互惠性活动：冗杂或模棱两可、行政色彩浓厚的国际化政策导向抑制了创新；大学行政机构和劳动密集型的管理规定不断带来资源上的压力；缺乏问责的海外项目管理意味着不会有人去为改革承担风险；大学已经在最大程度上发挥其基础设施、资金和人力资源的潜力，很难再创造全球性机会等。近期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的“2013年加拿大国际教育局会议”（the 2013 Conference of the Canadian Bureau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上代表团指出，与新的国家建立海外合作关系，这一合作使命虽然指明了未来的发展方向，却仍然需要强有力的领导和外资支援。

作为高等教育全面改革的推动力，国际化在乌克兰的学术进程中经历了许多其他国家相似的发展轨迹。如果没有激励性举措，国内教育改革（如直接的学分互换、院校内

部重组等)的开展和实施就很难进行。在全球背景下,围绕着一所院校开展的国际化战略成为全面改革的助推器。由于院校在战略规划、财政和人力资源分配以及对具体发展方向的认同上存在障碍,因而如果没有改革,

国际化战略的实施机遇也就稍纵即逝了。如果能在国际合作伙伴的帮助下稳步实施改革,乌克兰或许可以成为独联体国家中的创新典范。

新书推介

Freeman, Sydney, Jr., Linda Serra Hagedorn, Lester F. Goodchild, and Dianne A. Wright, eds. *Advancing Higher Education as a Field of Study: In Quest of Doctoral Degree Guidelines*. Sterling, VA: Stylus Publishing, 2014. 340 pp. \$45 (hb). ISBN 978-1-62036111-5. Web site: www.Styluspub.com.

本书聚焦于美国高等教育领域的博士生学习及一系列与高等教育研究进展相关的问题。书中对2012年美国和加拿大进行的一项博士项目调查予以分析,探讨了学生职业发展、高等教育研究进展、高等教育标准促进委员会(the Council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tandards in Higher Education Programs)发挥的作用等主题。

Greeley, Andrew W. *The Changing Catholic College*.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2013. 226 pp. \$29.95 (pb). ISBN 978-1-4128-5286-9. Web site: www.transactionpub.com.

早在1967年就出现了介绍美国天主教院校的著作。如今,凯文·克里斯蒂亚诺(Kevin Christiano)之作是对美国天主教院校重新展开的全面介绍。书中以社会和历史的视角探讨了天主教高等教育的发展,并对部分高等院校、教学机构、行政机构以及学生进行分析,以此呈现半个世纪以来天主教院校发生的巨大变化。

Kehm, Barbara, and Christine Musselin, eds.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in Europe: 25 Years of CHER. Rotterdam, Netherlands: Sense, 2013. 134 pp. (pb). ISBN 978-94-6209-399-7. Web site: www.sensepublishers.com.

25年前成立的高等教育研究协会(Consortium of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ers)是世界高等教育研究者的重要组织之一,并着眼于整个欧洲。该书聚焦于高等教育研究协会的发展,包括对年度会议、欧洲项目和高等教育课程管理等不同话题的讨论。

Kezar, Adrianna. *How Colleges Change: Understanding, Leading, and Enacting Change*.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255 pp. (pb). ISBN 978-0-415-53206-8. Web site: www.routledge.com.

凯泽(Kezar)在介绍高等教育变革的基础上,详细考察了美国院校计划和实施变革的相关内容,并加以案例展现变革是如何发生的。在罗伯特·伯恩鲍姆(Robert Birnbaum)的《大学运行模式》(*How Colleges Work*)经典著作之上,本书聚焦于21世纪美国实施变革的具体内容。书中同时探讨了有关变革的一些理论。

King, Roger, Simon Marginson, and Rajani Naidoo, eds. *The Glob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2013. 762 pp. \$415 (hb). ISBN 978-1-78100-169-1. Web site: www.e-elgar.com.

本书全方位汇集37篇经典文章,以不同

视角展现全球化的各个方面。书中全部章节来自之前发表的文献资料,包括大学排名的作用、国际学生和教师流动、行政管理的趋势、国家和全球竞争、市场化等主题,并反映了一系列观点。

Kline, Kimberly, ed. *Reflection in Action: A Guidebook for Student Affairs Professionals and Teaching Faculty*. Sterling, VA: Stylus Publishing, 2014. 185 pp. \$29.95 (pb). ISBN 978-1-57922-829-3. Web site: www.Styluspub.com.

本书作者以一个美国人的视角揭示高等教育学生事务中的争议问题。通过运用行动研究,作者探讨了专业伦理问题、学生事务相关内容、种族和文化问题、高等教育教师职业发展等主题。

Knight, Jane, e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Hubs: Student, Talent, Knowledge-Innovation Models*. Dordrecht, Netherlands: Springer, 2014. 251 pp. \$129 (hb). ISBN 978-94-007-7024-9. Web site: www.springer.com.

本书旨在分析一些国家在海外教育资源整合以建立吸引生源的中心、发展高等教育过程中出现的教育摩擦问题。简·奈特(Jane Knight)通过一种视角首次对教育摩擦展开研究并予以界定。书中还呈现了来自海湾地区、中国香港地区、新加坡、博茨瓦纳、韩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案例。

Lane, Jason E., and D. Bruce Johnstone, eds. *Higher Education Systems 3.0: Harnessing Systemness, Delivering Performance*.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13. 323 pp. \$24.95 (pb). ISBN 978-1-4384-4978-4.

Web site: www.sunypress.edu.

本书重点介绍了美国公立高等教育系统是如何有效运行的。虽然数据来自美国,但对于许多寻求建立有效差异化学术系统的国家而言,书中分析具有全球意义。本书探讨的主题包括美国高等教育系统发展史、高等教育系统的自治和权威、高等教育财政系统的作用、全面治理及其体系、学术治理系统的作用等。

Lombardi, John V. *How Universities Work*.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3. 220 pp. (pb). ISBN 978-1-4214-1122-4. Web site: www.press.jhu.edu.

隆巴迪(Lombardi)是美国最成功的大学校长之一,他针对美国研究型大学写出一本短篇著作。在若干顶级院校担任校长期间,隆巴迪通过观察和研究,身处研究型大学之核心,聚焦教师、治理、管理、财政与预算、教学等关键问题。尽管本书内容仅与美国经验相关,然而其仍然具有推广意义。

Medina, Leandro Rodriguez. *Centers and Peripheries in Knowledge Produc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238 pp. (hb). ISBN 978-0-415-84079-8. Web site: www.routledge.com.

本书以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Bourdieu)的视角对人才培养进行研究,并从怎样与国际社会科学共同体相互联系的角度聚焦阿根廷政治学家的职业发展。书中还分析了发表模式、国际问题的挑战以及阿根廷政治学家的立场。

Morris, Michael H., Donald F. Kuratko, and

Jeffrey R. Cornwall. *Entrepreneurship Programs and the Modern University*.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2013. 289 pp. \$125 (hb). ISBN 978-1-78254-462-3. Web site: www.e-elgar.com.

本书在美国高等教育背景下对创业教育这一新兴领域提供了实践指导。由于项目处于学院管理之中,因而它们得以迅猛发展。书中对课程、海外合作课程项目以及这些项目的价值等主题进行了探讨。

Muborakshoeva, Marodsilton. *Islam and Higher Education: Concept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Abingdon, UK: Routledge, 2013. 179 pp. (hb). ISBN 978-0-415-68750-8. Web site: www.routledge.com.

本书主要以巴基斯坦为例,讲述了伊斯兰文化是怎样与西方高等教育和殖民主义文化相互交织而同时形成伊斯兰高等教育的。书中以一些巴基斯坦高校为例,对院校与伊斯兰文化理念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个案研究。

O'Shea, Joseph. *Gap Year: How Delaying College Changes People in Ways the World Need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4. 183 pp. \$29.95 (pb). ISBN 978-1-4214-1036-4. Web site: www.press.jhu.edu.

本书提出如果年轻人在中学和大学之间的这一“过渡年”能参加一年的志愿者服务或其他活动就会有所裨益。此外,本书还以心理学和青年发展理论对其观点作以支撑。

Synott, Marcia Graham. *Student Diversity at the Big Three: Changes at Harvard, Yale, and Princeton since the 1920s*.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2013. 370 pp. \$49.95 (hb). ISBN 978-1-4128-1461-4. Web site: www.transactionpub.com.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美国大学努力构建多样化的生源和教师群体,并拓展选拔人群。如今,那些最为著名的大学甚至同样面临这一压力。本书对犹太学生和教师如何从大学边缘进入中心、合作教育的发展、同性恋学生、残障学生等主题予以分析。

Trachtenberg, Stephen Joel, Gerald B. Kauvar, and E. Grady Bogue. *Presidencies Derailed: Why University Leaders Fail and How to Prevent it?*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3. 184 pp. \$34.95 (hb). ISBN 978-1-4214-1024-1. Web site: www.press.jhu.edu.

本书探讨了“什么会让美国大学校长犯错”和怎样创造一个成功的管理环境。书中通过个案研究,对犯错的本质进行剖析。虽然只讨论了美国的情况,但本书仍对其他国家的学术领导者具有借鉴。

Williams, Damon A. *Strategic Diversity Leadership: Activating Change and Transform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Sterling, VA: Stylus Publishers, 2013. 481 pp. \$49.95 (hb). ISBN 978-1-57922-819-4. Web site: www.Styluspub.com.

美国高校中的多样化是由道德、种族、性别构成的总体社会的现实写照。近些年来,多样化还涵盖不同的社会阶层和经济背景。本书由一位美国著名大学的负责多样化的官员所著,探讨了创建一所多样化学术院校的各个元素以及面临的挑战。

Wyner, Joshua S. *What Excellent Community Colleges Do: Preparing All Students for Success*. Cambridge, MA: Harvard Education Press. 2014. 184 pp. (pb). ISBN 978-1-61250-649-4. Web site: www.harvardeducationpress.org.

本书从众多院校经验中揭示了美国社区学院的成功发展方向。书中包括毕业和转学、平等和发展中的教育、学习效果、劳动力市场以及校长共同体的角色等主题。

Zgaga, Pavel, Ulrich Teichler, and John Brennan, eds. *The Globalization Challenges for European Higher Education: Convergence and Diversity, Centers and Peripheries*. Frankfurt am Main, Germany: Peter Lang, 2013. 387 pp. (hb). ISBN 978-3-631-63908-5. Web site: www.peterlang.de.

本书全面探讨了全球化对欧洲的影响，包括欧洲化对院校多样化的影响，欧洲的国际流动、欧洲对奥地利高等教育的影响、波兰入学问题以及一系列对欧洲东南地区的区域分析。

Zgaga, Pavel, Manja Klemenčič, Janja Komljenovič, Klemen Miklavič, Igor Pepac, and Vedran Jakačić. *Higher in the Western Balkans: Reforms, Developments, Trends*. Ljubljana, Slovenia: Center for Educational Policy Studies, University of Ljubljana, 2013. 99 pp. (pb). ISBN 978-961-253-107-2.

本书文章聚焦巴尔干半岛西部地区的高等教育，对其实施博洛尼亚进程（the Bologna process）、大学治理和分化、平等问题、学生在院校治理中的角色、私立高等教育、国际化等主题展开分析。

